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〇期 ——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二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1f)

【当事者说】“文革”漫谈（上）	王年一
【口述历史】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之二）	老 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文革”漫谈（上）

• 王年一 •

小序

萧乾老先生 1986 年 8 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几篇《“文革”杂忆》，我现在来写《“文革”漫谈》。萧老写的是亲身经历，我写的则海阔天空，举凡“文革”的人、言、行、事，无所不谈。大多不是亲身经历。

坦白地说，我没有写作计划。兴之所至，思之所至，随手写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故曰“漫谈”。

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写了一套《随想录》，它以说真话而著称于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如草芥，但敢自诩：拙谈中没有一句假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一篇一篇写下去。

一、“文化大革命”从何时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陈伯达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开端。”

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1963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此说相当含混，没有确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事实，所以为人们所不取。

毛泽东对此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从1965年11月开始。他于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1967年5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持此说，从这个《通知》的如下行文虽可以看出：“这个提纲（按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竭力抗拒。”“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另一个说法是从1966年5月开始。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五个月不到。”

这两个说法都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是从1965年11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从1966年5月开始的。巴金说：“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他说“十一年”，就是从1965年11月算起的。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既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也可以说是全面发动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党内“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

二、“文革”前毛泽东眼中的中国现实

毛泽东认为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而中国共产党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既然如此，加上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大党、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他就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国逐步地成“世界的革命中心”。

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确指出：“……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不是出于狂妄，而是出于挽“修正主义”狂澜的高度道义感和责任感。这种认识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一因为它的大前提（即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是错误的；二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革命中心”，所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伴随着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这种认识，产生了两方面的想法：一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纯洁”而“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鲜艳红色的样板；二是认

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纯洁”、太不“完美”了，存在许多“黑暗面”。国际“反修”的深入，强化了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的强化，中国建设成样板的心情越急切，就越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理想。“左”倾错误特别是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使中国的现实在毛泽东的眼中失真。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一考虑，主观不符合客观。他是从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看得非常严重的错误估计出发的。这里指出的，都是根本性的错误。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中国现实的估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等文献和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现实是怎样的呢？

（一）知识分子存在着“修正主义阶层”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6年6月27日两次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与法国马尔罗谈话。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存在？毛泽东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马尔罗又问：为什么有作家？毛泽东答：有一部分的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收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收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说：“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

1966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

在毛泽东修改过三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中，也有着极端的估计。

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正确地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按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党中央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正确和不正确的认识都给了毛泽东以相当影响，此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说：党内大约有100万知识分子，这100万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代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发展，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越来越违反实际。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

（二）党内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对情况作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他说：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他又说：“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形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何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1967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作过解释。他说：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作走资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毛泽东认为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干部形成了党内的派别，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党内根本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闻天说：“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走资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作了这样的规定。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12月26日以后，情形才有了变化。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

反，……如果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写道：“中央和中央各机关，……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写道：“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年，63、64、65、66，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又说：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中宣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手里，毫无办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对斯诺说到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党内上层状况的估计：“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既往时说：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央第一线出了“修正主义”。

（四）北京可能发生“政变”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据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说，苏方有人恶意煽动。11月7日晚上，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据《王光美访谈录》，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苏联想搞垮中央之心，早已有之。）贺龙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朱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等人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

我们的严重挑衅。在随后举行的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又就此事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我代表团才未再加追究。搞掉赫鲁晓夫得力于军方的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如此猖狂挑衅，对毛泽东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毛泽东此后想到了政变问题。

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按为1966年6月），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1981年6月19日，许世友在一个会议上说：“‘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说，党中央有个反革命集团要刺杀我怎么办？我说出兵北上。”

这种估计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毛泽东与中央一线之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异大于同，矛盾盘根错节，毛泽东又作出了这种严重得无以复加的灾难性的估计，他就以个人否定集体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

三、一篇文章的转载问题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转载问题，引起轩然大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现在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此说是“最高指示”，自然影响很大，成为定论。1991年8月出版的、供中共全党学习用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也说：“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且不说全国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且不说从不转载、不发行得不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结论，本篇只说毛泽东说的“各省都转载”合不合乎事实。

完全与事实不合。

这里提供一点资料：

（一）姚文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上海《解放日报》11月11日转载。华东各省报，分别于11月24日、25日、26日转载，这是外地转载得最早的。11月24日转载的是《新华日报》（江苏）、《浙江日报》（浙江）、《福建日报》（福建）、《大众日报》（山东）。11月25日转载的是《安徽日报》（安徽）。11月26日转载的是《江西日报》（江西）。华东各省报显然得到了关于姚文发表的背景（即姚文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的消息，所以在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之前转载了姚文。但也晚了几天，不能算及时转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这个记载本身就说明不是“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这样写又是故意蒙骗人们，掩盖了除上海《解放日报》外华东各省报到了11月下旬才转载的真相。

（二）11月下旬，上海市委向周恩来透露了姚文发表的背景，周向彭真打了招呼。罗瑞卿在上海也得到了信息，也向彭真通了风。彭真11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布置北京报纸转载姚文。11月29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姚文，加了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写成又经他们审改的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

（三）从12月1日起，华东以外的省报才开始转载姚文。转载的日期是：《黑龙江日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12月1日；《山西日报》——12月4日；《陕西日报》、《湖北日报》——12月5日；《云南日报》——12月11日；《宁夏日报》——12月14日；《青海日报》——12月15日；《四川日报》——12月18日；《贵州日报》——12月19日；《西藏日报》——12月21日；《吉林日报》——12月24日；《新疆日报》、《甘肃日报》——12月27日；《辽宁日报》——12月29日；《内蒙古日报》——1966年3月4日。……请注意，这些报纸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新华社播发了姚文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它们刊登了。

（四）《南方日报》、《湖南日报》始终未转载姚文。

结论：毛泽东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各省都未及时转载，为什么独独归咎于北京市委呢？

四、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

看档案材料时，我看到一份没头没脑的材料：铅印，标题是“当前的几个问题（1966年8月12日）”，正文开列了10个问题，落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印”，共两页。10个问题都写得很简略，如第一个问题全文是：“（一）强调学《十六条》，用《十六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写社论）”第10个问题全文是：“（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简报》，各省要求发一份。”

我很注意6、7两条。先把这两条抄录如下：“（六）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

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七千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七）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革命为主要任务。一般不要到处乱跑，也不要抓别单位的人来斗争。支援别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自己的先进经验帮助别人，也向别人学习。”

我推测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供自己用的，10个问题系中央文革小组所议定。我之所以注意6、7两条，因为它与4天后陈伯达的公开讲话是迥然不同的。1966年8月16日，陈伯达公开讲话，鼓动外地学生来京。这篇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8月16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陈伯达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为了弄清楚问题，我写信向当时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力先生请教。我附上复印件，问他两个问题：（1）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所议？（2）何以4日后陈伯达讲话的调子与此截然不同。

王力即复。承他于猴年大年初一（1992年2月4日）复我。复信不长，除开头称呼我和末尾署名并写“1992年2月4日”外，全文如下：“来信收到，简复如下：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会议期间，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仍继续进行。碰头会，周恩来和陶铸每次都参加的。这个文件，是最近几次碰头会上议的主要问题的概括，主要是向毛主席的汇报。当时大家都不赞成大批人员来京和串连，因为无法接待，而且会造成铁路和其他交通的压力。但是汇报后毛主席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条意见。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所以才有8月16日陈伯达的讲话和以后的做法。原来，8月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见群众，看到了极其热烈的场面，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并动了感情。而这次接见，事先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祝新春安祺！”

王力在未曾发表、允我使用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回忆——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中说：“大串连的根子在接见红卫兵。8.18大接见，主席提出，要几千万人直接同他见面，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杭州召开的）就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先“乱”而后“治”。

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大量坏事，名声很臭，其实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过。这里提供了做好事的一个例子，不过好建议被否定掉了。

五、郭沫若的自谴和自解

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为起点，“文革”进入准备阶段。准备阶段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了“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蛮不讲理地否定了一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文艺工作者在劫难逃。

1966年4月，石西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命”的报告。郭老听了报告之后，4月14日在会上发言。他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工农兵服务”。发言全文载于4月28日《光明日报》，由编者加了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又载于5月5日《人民日报》。

文化巨匠如此自谴，全盘否定自己，是出于紧张呢，还是出于严格要求自己呢？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

尽管巨匠如此自谴，北京大学还是给郭老贴了许多大字报。周恩来下令：只许贴在房间里。毛泽东指示：保护郭沫若。

尽管郭老发言出于好意，但是实际上对“文革”不利。如果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敬重与热爱毛泽东的郭沫若都需要彻底否定自己，那一切就可想而知了。对于郭老的发言，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感到惊诧，甚至有人以为他受到了压力。

在发言有了不良影响、又得知中央对他予以保护的情况下，郭老作了自解。

1966年7月4日，他在于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发言特意说到他4月14日的发言。他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发言全文载7月5日《人民日报》。如此解释，大致能自圆其说，挽回了一些影响。（最能挽回影响的还是没有打倒郭沫若。）

一位青年教师徐正之，在他写的一篇有关郭老的历史剧《武则天》的文章中，对郭老4月14日发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1967年8月24日，徐将文章送郭老，同时写一短信，请阅后提出意见，并将文章“挂号退还”。第二天，即8月25日，郭老亲笔作复，全文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你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经500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专复，顺致敬礼

郭沫若8月25日

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凤凰涅”的故事，可谓妙笔生花。

毛泽东1973年两次指责郭老，江青1974年1月指责郭老，但都有所肯定。这些都不是本篇所能谈的了。

（1999年8月作者注：今年上半年，有名的武汉《今日名流》刊物，以较大篇幅发表了武汉流虹所作《晚年郭沫若的人生败笔》长文，很清楚地说到了上述问题。此文是难得的佳作，敬请参阅。）

六、一张死亡名单

1980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向有关部门报送《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残酷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名单》。许多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这张名单没有公布过，所以许多人不知道这张名单。它是中国文联所写，自然有其权威性。现将《名单》一字不易地抄录如下：

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诬陷、凌辱下，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许多同志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含冤而死，甚至惨遭迫害；有的因生前受到残酷迫害，心身遭到严重摧残，先后逝世。其中有：

著名作家、诗人：老舍、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杨朔、郭小川、闻捷、蒋牧良、李广田、刘树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间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罗广斌、海默、韩北屏、远千里、方之、萧也牧；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叶以群、侯金镜、陈笑雨、徐懋庸；著名翻译家董秋斯、傅雷、满涛、丽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上官云珠、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顾而已、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著名地方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严凤英、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顾圣婴、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貽德、萧传玖；著名民族歌手、民间诗人毛一罕、琶杰、王老九、霍满生；著名摄影家张印泉、郑景康；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著名木偶艺术家杨胜等同志。这些同志的逝世，是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是林彪、“四人帮”的血债，是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证。

中国文联办公室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

这里说的“致死”，显然不限于1976年10月6日以前。如郭小川是1976年10月18日逝世的，郑律成是1976年12月7日逝世的。

抄出上述名单，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这张名单并不完全，遗漏不少。既然不限于1976年10月6日以前，既然包括“因生前受到残酷迫害，心身遭到严重摧残”而逝世的，那就要加上许多名字，如李六如、赵丹、周扬、瞿白音、冯（吉吉）。

这张名单的标题很不确切。名单中拉上“林彪”，是当时钦定的用法，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一大批文艺家的受迫害，与林彪并没有关系。若干文艺家之死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下发是有关的，但是《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并定稿，又是中共中央批发的，自然不能归咎于林彪。林彪一般不管文艺界的事，不管小事，不管某个人的事。标题中提到“四人帮”，也不确切。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而若干文艺家死于1973年8月以前。江青、张春桥在文艺界做过很多坏事，负有罪责；但是若干文艺家之死原因复杂，与江、张也无关涉，不能一概归咎于江、张。著名翻译家傅雷，家中被红卫兵搜出了亲戚寄放的“反动物品”，他与夫人朱梅馥受不了凌辱，双

双自缢而死，这就与江、张没有直接关系。29岁的优秀钢琴家顾圣婴同母亲秦慎义、弟弟顾握奇不堪虐待而一齐自杀，主要原因是受了父亲顾高地冤案的株连。

每一个文艺家之死都有一个悲惨的甚至惨绝人寰的故事。他们的死，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控诉，也是对“左”倾错误的谴责。

（未完待续）

~~~~~

【口述历史】

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之二）

• 老 田 •

#### 四、 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 he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

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着，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〇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〇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 六、 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谈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 七、 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时，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

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重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



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直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 九、 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橱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

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〇〇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 十、 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

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

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舜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

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〇〇六年八月一日

（全文完）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